



本报首席记者 王湛  
通讯员 陈瑜思

## 郑强的贵州四年,压力与理想交织。他说—— 支援西部,只有一个郑强不够

穿着棕色皮鞋的脚踩了一下地面,整个人突然蹦到了沙发后面的窗口,指着外面的树林,“这片林子美丽吧?这个中心广场明亮吧?”

这是3月初的贵州大学,校长郑强的会客室。风从纱窗里透过来,很是有些凉意,天上积压着阴沉沉的云,木樨树的枝桠倒伏在院里,匍匐着向前生长,悠悠地伸出一蓬蓬绿来。57岁的郑强在说“理想”。

他的确是个理想主义者。

### 1 报恩

“我是对口支援过来的,完全出于自愿。”这是郑强的开场白,“至于很多人匪夷所思的,为什么要从浙江跑到贵州来,很简单,就是为了报恩。”

“报恩”两个字,郑强说的时候,加重了声音。为了报三个恩。第一是为浙江大学报恩。

1937年秋,抗日战争爆发。当年9月起,校长竺可桢率浙大700多名师生,一路辗转,从东南走到西南,途经六省,行程2600多公里。最后于1940年初,抵达黔北遵义湄潭办学。

“此后七年,贵州人民收留并养育了颠沛流离的浙大师生。”郑强说,“正是在贵州大地培育出了浙大‘东方剑桥’的美誉,这个恩,要报!”

“此外,我还要报两位老师的恩。”他说,在他成长过程中给他最多指导、最大帮助的两位恩师——四川大学的徐僊院士和北京大学冯新德院士都曾在贵州湄潭读书。

“我在浙大本就干得好,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副书记,我的血液中流淌着浙大求是的血液,加上我前面讲的两位恩师对我的培养。我也觉得到贵州大学体现了浙大人的责任和担当。”

因为这份担当,2012年6月1日,贵州大学110周年校庆前夕,郑强来到贵州大学担任校长。

其实,他与贵州这片土地的缘分,早就在血脉里生长出来。

他父亲当年随解放军杨勇、苏振华兵团进军西南时曾在贵州战斗,母亲也曾在贵州学习和生活过。

跨越了大半个中国,1675.4公里,他从杭州来到贵阳,从一所全国一流著名高校到了一所地方高校。

他说,刚开始,是一种走入陌生天地的欣喜,浑身都充满干劲。“一个贵州省,在欧洲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国土面积了。把这样一个地方的大学搞好了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吗?”

他在办公室里,住了八个月。那段时间,他每天都来不及吃饭,肠胃不好,拉肚子一天七八次,吃的药比吃的饭还多。

助理透露,这些年,给教职工订的体检套餐,校长都没去过,“真的没时间去”。

他的办公桌上,如今仍散着些消炎药,收纳柜里,还有一塑料箱瓶瓶罐罐的各式药丸。

### 2 孤独

印象中,贵州大学就是校歌里的模样,“溪山如黛,常沐春风,学府起黔中”。推开窗,就能见到山,无边无际的绿色,常闻百鸟啁啾,书卷味流淌。

学校对面是花溪国家湿地公园,满目苍翠,夏天荷叶满田,秋天芦苇轻摇。

但刚到学校的郑强,傻了眼,学校的核心区杂乱无章,树木歪七扭八地长着,道路破损严重。一下雨,行走都困难。颇有历史的大礼堂外墙也因长年失修显得破旧。完全失去了“核心功能”。

“以前这里是走不了人的,树木倒下来,青苔满地,地如沼泽,铁围栏锈迹斑斑。”

他上任的第一把“火”,就“烧”到了这些树木。为了在树林里铺上道路,供人行走,必须移植一些树,进行彻底整修。

之前有媒体报道说:当时学校有人反对,还举了牌子(抗议),说那些“参天古树”代表贵大魂。有人根据他的名字联想到了动画片《熊出没》里爱砍树的“光头强”,郑强也落下一个“光头强”的绰号。

“并不存在砍树事件。给树木进行修枝,被个别老师认为是砍树,其实只是将一些杂树移栽到新校区。凡是移树必须要修枝,不修枝就活不了。”主管该项工程的贵大后勤处负责人说,“这项工作事先报政府绿化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的。”

这位负责人说,所谓广大师生游行抗议的说法并不属实,“光头强”也是媒体的杜撰。绿化整治后,这片核心区成为了贵大师生活动的主要场所。只要天气晴朗,长凳上便座无虚席。不少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也喜欢来这里。

但是,似乎从所谓的“砍树事件”开始,郑强倡导的每一项改革都不顺畅。

维修校园,颇有争议;购买校车,被人质疑;制定章程,有人反对。前两年,他说自己很孤独,似乎做什么都不能被理解。

不过,他依然顶住了重重压力,强力推进改革发展——修校园,买校车,对教师进行考核,狠抓教风学风考风,推行通识教育,引进高端人才,倡导学术强校,启动新校区建设……

一位退休教师把这理解为“专制”,“这个大学,就差姓郑了。”

贵州大学阳明学院院长张寒松教授说,郑强就是这种性格,遇事讲原则,不讲情面。“刚开始的时候接受不了,时间久了,习惯了,他就是一个率直的人。”

### 3 两面

有人说,郑强只会吹牛;有人说,他说得多,做得少;还有人说,他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听掌声,把生活也当舞台了。

他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声音,但是依然愿意开口。有一说一,遇到看不惯的,会当面指出来。

作为一个地道的重庆人,这直来直往的性格或许与生俱来。

很多人眼里,他高调,还有些张扬。但贵州大学经济学院的大四学生刘正玮认为,“一枚硬币都有两面”,正因为这种性格才让他们的“强哥”有勇气,有魄力。

2012年,郑强花了三个月时间,通过走访考察学校部门和学院,启动了贵州大学行动计划,提出尽快启动建设贵州大学新校区。在省委书记到学校视察时,他跟上省委书记的车把计划书递了上去。很快,贵大拿到了40个亿,新校区建设启动。

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,十分理解郑强的风风火火,“人无完人,郑强校长有时候做事急一些,说话直一些,我觉得都是正常的。但郑强校长的确是非常优秀的校长,对贵州大学的发展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”

“有人认为郑强校长是愤青。而我认为郑强校长是在舆论场上发出教育的好声音。”陈鸣明说,“郑强校长极大地提高了贵州和贵州大学的知名度、美誉度。”

“我的愤青是大胆对不正确的东西说不!就好像做实验,见不得差错。”郑强说,理工科的人实验做多了,性格就成了这样。

所谓人红是非多,人一旦被关注了,每句话都容易被放大,被曲解。

“我受的伤害,比那些不说话的人,多多了,但是难道因为这样,我就不说话了吗?在有些方面,我必须坚持,这是为了维护教育的根本。”说这话的时候,郑强语气强势,眼睛因为表情用力显得更大了。

为了教育,他仍坚持发声,还鼓励学生应该大胆表达自己,“一个学校如果教育孩子千篇一律,都这样稳重、低沉,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、独特的见解,那中国的教育就是失败的。”

因为他,贵州大学开始被更多人知道。采访中,所有的人都认为:“郑强成了贵州大学的名片,他让贵州大学的名字响亮了。”

2016年12月23日,贵州大学在人民网发布的《2015-2016中国高校社会影响力排行榜》中综合指标位列第19位。(下转B3版)